



自由之泉



驴背诗思

校园雕塑 徜徉在美育和文化之间

■本报记者 韩天琪

的环境出发的,从这点来讲,任何一座雕塑都应该有其独特的特征存在,校园雕塑也不例外。”

对于校园雕塑来说,这种独特的特征,正是因其不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产而体现出的独特大学文化。

一池田田的荷叶,几支苞苞待放、亭亭玉立的荷花,一座白色的水泥雕塑就坐落在荷花中央,两只可爱的小牛使着全身力气,伸开四肢,一前一后地用牛角顶着地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孺子牛雕塑是科大78级校友所献。科大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和勇气,不畏艰难、勇于钻研的刻苦拼搏精神在两只小牛身上尽显。

诗人贾岛、陆游经常骑在驴背上构思,正是行途的颠簸使他们诗思泉涌。而诗圣杜甫一生骑驴做诗千首,字里行间满怀着对国计民生的无限关切。复旦大学光华塔楼西侧的驴背诗思雕塑,提醒着所有复旦学子,在追求人生目标与前途的同时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增强自己内在的修为,淡然处事,有浪漫与哲思,有思考与远见。

在蔡劲松看来,大学校园雕塑艺术表现的价值,就在于以想象力为基础,以公共艺术的形态表现大学人情,为大学自身创造一种想象性经验或活动,并协调统一于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文化意蕴与艺术境界之中。“换句话说,大学人和艺术家在共同创作校园雕塑作品的过程中,所能抵达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层级和深度,是决定雕塑艺术境界与文化意蕴的关键。”

“雷人”雕塑怎奈何

曾几何时,城市中出现了很多造型奇异的建筑,人们纷纷或戏谑或调侃地给这些建筑起了不太雅观的外号。有些校园雕塑也不能幸免。

很多雕塑为什么被吐槽?因为让大家产生了不很贴切的联想。刘悦笛坦承,国内大学校园中好的雕

塑并不多见。造成同学们“曲解”校园雕塑意义的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艺术家的超前创作超出了普通大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另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是,雕塑本身就是失败的”。

刘悦笛强调,在大学做雕塑一定要注重人文性、科学性、审美性和大学的气质文化相配。“校园雕塑要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要用形象表现理念、艺术的形象一定要和内容相匹配,而不是过于抽象,使大家难以理解其所要表达的含义。”

为了减少“雷人”雕塑出现在大学校园,蔡劲松建议将校园雕塑建设的本质看成是让更多大学人亲历并积极参与的一项文化实践活动。“大学公共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大学决策者的事,也不仅仅是公共艺术家的事,其建设流程包含构想、决策、采纳、实施、融合、评估等环节。”

现在很多校园雕塑的建设由校园美化或基建部门负责,缺少完备的审核委员会的评审过程。校园雕塑是一个“命题作文”,而不是艺术家的自由创作。所以刘悦笛认为,校园雕塑的招标应当成立审核委员会,由来自人文、科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组成。当中有从事艺术设计专家,也有对校史比较了解的专家,由他们共同决定什么样的雕塑可以进入校园。“大家可以从各方面提出意见,进而引导艺术家进行创作。”

要弄明白校园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雕塑,就要对这所学校的历史、人文底蕴、雕塑坐落的位置、和周围建筑、景观的关系等有一定的理解。

让校园雕塑成为 校园生活和大学文化的一部分

校园雕塑究竟能给大学生带来什么?刘悦笛和蔡劲松的看法殊途同归,无非是在教学中师生们达致“美”的同时,传承大学的精神与文脉。

“中国现在文盲不多,美盲多。”刘悦笛的这一判断有点儿触目惊心。

美育无疑应在大学人才培养中占有一席之地。体悟到大学之美需要校园雕塑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所谓润物细无声。审美是不能直接给予的,但可以通过一种滋润和悄然的方式,“审美的事物和对象出现在身边,就是最好的审美教育”。刘悦笛说。

回归到生活中,而不是在生活之外、与每个人无关。感受校园雕塑不是去美术馆和艺术馆参观,而是在每个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中。

在具体操作层面,刘悦笛建议学校主动做一些引导工作,“比如可以在雕塑前设置说明性文字,引导大家理解雕塑的内涵。仅仅说美的校园参观和校史教育是不够的,要把美育放在平时,让美育成为生活的美育”。

回到文章开头的“自由之泉”,那个曾经给刘悦笛带来震撼的雕塑。美国多数大学十分注重利用有限的资源,特别是校园空间的公共艺术作品(包括永久性公共雕塑艺术、各类艺术与科技作品展览等),去创造高水平的艺术鉴赏与学习经验。

“这是一个提升学生艺术素养教育的最基本要素——校园公共艺术‘大环境’,它们对于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艺术审美教育、感知多彩而又复杂的艺术世界,融入大学的文化艺术传统之中是至关重要的。”蔡劲松提示,今天,大学中的校园环境已经远远不是建几座楼宇、栽一片树林、种一些草坪、挖几个池塘那么简单。

大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历史印记,很大程度上已内化为一种校园文化景观——那些浸透着浓郁大学内涵和文化韵味的治学、育人环境,让一代又一代的师生从中体会到厚重而丰富的精神支撑。从这个视角看,大学文化与校园雕塑的作用是相互的,大学文化通过校园雕塑来反映,大学文化改变着校园雕塑,而校园雕塑也作为大学文化的一部分,传承和延续着大学的精神与文脉。

百师生欢迎和欢笑中,卢靖出席致辞,并亲手将钥匙授予校长张伯苓。

为纪念卢靖,新建馆舍取其表字“木斋”,命名为“木斋图书馆”。“当年为了修建木斋堂,卢靖还在塘沽一带修建了一座砖厂,专门为木斋图书馆提供砖瓦。”李世锐补充道。据说,“特供”的砖块耐烧程度可媲美烧制瓷器的砖窑所用的砖块。木斋图书馆建造的坚固与巧妙,令前来参观的柳亚子曾经为其赋诗一首:“百城南西足论功,堂构巍峨缔造雄。十两黄金书万轴,教人长忆木斋翁。”

1937年,日本人的狂轰乱炸几乎将南开大学夷为平地,三所建筑寿终正寝。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迁,合并为西南联大。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卢靖依然惦念着师生们,并资助二百万元,救济生活窘迫的教师。1948年他逝世前,还嘱托其子女继续捐资,以助南开重建图书馆。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1949年天津解放,历经坎坷的南开大学从西南迁回,重获新生。1951年秋,木斋图书馆在原址修复,建筑面积为3030平方米,继续做图书馆使用,仍名为“木斋图书馆”并报教育部核准。1958年,位于新开湖畔的新图书馆建成投入使用,木斋图书馆改作学校办公楼。另外两栋建筑也得以重建。重建后的思源堂成为化学系的教学楼,如今则是医学院的教学楼。秀山堂则在原址上重建地上一层和部分二层,作为南开大学的附属幼儿园使用至今。

2012年,南开大学津南新校区规划时,本着贯通历史、薪火相传的设计理念,将校区西部辟出历史纪念馆区,复建木斋图书馆、思源堂、秀山堂。其中,木斋馆和思源堂分别用于自然与文史类博物馆陈列、收藏和研究,秀山堂则将用于校史陈列和研究。

自2014年就开始整理南开大学自创立至今的学校建筑的李世锐说,对于这三所建筑及其背后的意义感慨颇深:“张伯苓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那个年代创办私立大学实属不易。现在复建三栋历史建筑也是为了缅怀先贤,饮水思源,让南开精神为更多人所了解。”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张伯苓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南开大学校训。他曾指出,“允公”是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则要培养人才具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日新月异”则要求每个人都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

百年来,南开大学一直秉承校训,不忘初心,在中国大地上扎下了文化之根、思想之根、民族精神之根。未来,复建的三所建筑将成为南开下一个百年见证者,成为记载“公能日异”的历史丰碑。

校徽故事

编者按

在与大学相关的所有文化符号中,校徽无疑是最庄重,也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为一所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直接体现,无论是校徽的设计过程还是最终的设计方案,都凝聚着校方和设计者对于“大学”二字最深刻的理解和期望。

然而,当我们面对校徽时,这份深藏在构图与色彩中的理解与期望,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吗?



四川大学是1896年建立的百年名校。一直以来,老川大就以“凤钟”的图形作为校徽的图案。

钟,本义为一种打击乐器,引申为计时器。在早期的学堂学校,钟被普遍运用。钟声响起,便是行学行教的命令之声。这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物,更是中华文化的象征。

上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改名为四川联合大学。1998年12月11日,恢复校名为“四川大学”,学校决定重新征集设计川大新标志校徽。

当天晚上,我漫步川大校园,思索新校徽方案。我最初的直觉,新标志应是一个“钟”形。因为老川大有一个古老的钟亭,老川大校徽也是一个钟的形象。“钟”确实是老川大的镇校之宝,蕴含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也符合现代文明的特点。

在古蜀国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如今,太阳神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它其实就是传说中的凤凰。一直以来,凤凰就是川大文明的吉祥物。新川大校徽中也应该有一对凤凰,薪火相传。

就这样,“凤钟楼”的灵感就产生了。而怎样使“凤钟楼”图案代表川大,隐含四川大学之形,既要庄重典雅,又要有美感且有文化味、现代感?为此,我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参考上千个中外著名优秀标志、商标、徽记,设计几百个图稿,反复修改调整审定,从中挑选出了最终的徽志图案。

川大徽志采用双圆套圆形徽标。双圆间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是川大的中英文校名。内圆正中则是“凤钟楼”图像标志。

凤钟楼图像标志是根据原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古建筑意象与凤凰图腾创意而来。代表中华灿烂文化的钟的两侧是一对双凤之间开成“川U”两字。“川U”即川大。U是正形,既像“鼎”形,更表示“UNIVERSITY(大学)”,与负形形成的“川”字一起,意指“川大”。同时,“川”字三笔画像三条水脉,向上交汇一点,形成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其中下端是“Men”的缩写M。一对凤凰、三条水脉,“川U”之形,且人立其中,整体有机融合构成钟的图像,同时又酷似一座蓄势向上、顶天立地的学术殿堂。

这样的设计,既隐含川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两次强强合并、三水融合的发展历史及革新精神,又寓意由三所重点高校合并一体的新川大,用钟声敲开百年树人、作育英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新纪元。

2002年3月确立并启用的川大新徽志,在把握历史的同时,又倾诉时代的精神,既是对百年川大人文底蕴的形象化昭显,也是寓意对学校百年历史文化的传承弘扬。

(作者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绘画系副主任,川大校徽设计者)

四川大学：凤钟楼背后的精神传承

张军

风物



木斋馆



秀山堂



思源堂

南开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 三馆复建 饮水思源

■本报记者 袁一雪

今年,南开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目前正在南开大学新校区——津南校区加紧建设的木斋馆、思源堂和秀山堂三栋历史建筑,是这一代南开教育者与南开学子们为学校“百岁生日”送上的礼物。复建的费用来自北京健康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伟国捐赠的一亿元。

接受民间企业家捐赠办教育,这一幕与百年前南开大学初创时的一幕跨越时空重合在一起。追根溯源,南开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由现代教育先驱张伯苓创建。没有国家经费的支持,他白手起家,建校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这是一次“私立民有”教育的实践。由此,张伯苓还得了个“化缘和尚”的绰号。

而此次复建的木斋馆、思源堂和秀山堂是那时南开大学获得国内外民间力量资助后,最早出现在校园的建筑,构成了南开大学雏形,也是早期南开大学集民间力量艰难办学的缩影和见证。

秀山为文,思源为理

在三所建筑中,最早出现在南开大学校园的是秀山堂。“秀山”二字取自天津籍督军李纯的表字。此人早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后追随袁世凯,深受器重。虽为武将,李纯却对教育情有独钟,曾先后在天津河北三马路、河东关帝庙等地创办秀山小学三处。

早在1919年,李纯就曾募集善款并推动北洋军政要员为南开大学捐资,让张伯苓和严修在南开中学的一片空地上,盖起了一座二层小楼。这座小楼是南开大学最早的管理部门和食堂的所在地。“第一年,南开大学招生96人,共毕业了23人。”南开大学副校长李士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1922年,南开大学已经发展到一两百人的规模,两层小楼早已不能满足使用。于是张伯苓等人在距离天津市区较远、租金较便宜的八里台地区的永租地,租借了一块面积为400亩的土地。此时,李纯的另一笔善款到了。那是他在1920年去世后,遗书嘱托其二弟李桂山,将遗产的1/4——约50万元捐助南开大学作为学校永久基金。

之后,用这笔基金修建的学校行政办公和文商科教学楼于1924年落成。整个楼体为三层楼,其中一层为半地,房间窗户与地面平齐,并被命名为“秀山堂”。

另一座同为三层楼,其中一层为半地下的思源堂,则有一半的“美国血统”。而关于这栋楼的来历,还有一段流传至今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时任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邱宗岳。

1920年,邱宗岳自美国学成归来,被张伯苓校长教育救国精神感染,来到南开大学任教。他一手创建了南开大学化学系,并任系主任,让南开大学成为继北京大学之后,我国第二个建立化学系的高校。

1922年12月初,美国罗氏基金会(即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南开大学参观考察,学校安排他们旁听了一节邱宗岳用英文讲授的普通化学课。只一节就扣动了罗氏基金团,他们认为南开大学教学质量不同寻常,教师治学有方,毅然决定捐款12.5万元,为学校建设科学馆。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全校师生的轰动,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传递着这一喜讯:“邱先生的一堂课换来了一幢楼!”

不过,有些棘手的是,罗氏基金团的捐款有个附加条件,即要求国内也要出一部分捐款。到哪里去筹这笔钱呢?恰巧袁世凯的嫡母袁太夫人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命儿子、河南企业家袁述之认捐国内的部分。